

欧元的理论基础述评

陈亚温

(厦门大学 经济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关键词 欧元 货币 理论基础 经济 政治

摘要 欧元诞生前后,美国的不少著名经济学家如弗里德曼、萨缪尔森、费尔德斯坦等,不管其流派的背景如何,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否定欧元,斥之为“一个愚蠢的举动”、“一定会夭折”、“欧洲更会发生战争”。赫赫有名的国际金融投机家索罗斯也在一旁帮腔、摇唇鼓舌、危言耸听。欧元启动后,一年多的低迷状态更使否定者如获至宝。事实上,欧元是世纪之交的“伟大创举”、国际金融领域的“伟大变革”,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尝试”,是使多少代欧洲人梦幻转为现实的“伟大实践”。目前,欧元虽然暂时走低,但“冬天既已来临,春天也就为期不远了”。欧元已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站稳了脚跟;已在国际债券市场上超过美元,成为占据榜首的发行币种;欧元在各国的官方外汇储备结构及国际结算地位中也越来越显示其魅力;欧元的汇率在国际外汇市场上也一定会回升。这一切,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欧元的出现,并非欧洲政治家的“心血来潮”,而是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

中图分类号 F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753(2001)01-0003-04

一、货币理论基础:最优货币区

199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籍加拿大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R·Mundell)自60年代以来一直研究国际货币问题。他之所以获此殊荣,主要是在两个方面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中作出了贡献。一是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该模型为开放型的经济如何进行宏观调控的政策操作创造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该模型区分了在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不同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同作用机制和不同调控成效。该模型指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与货币政策的无效性并存;而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成效显著的货币政策与几无成效的财政政策同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式的要点还在于,分析了一个国家货币政策的变化如何影响资本的流动,以及两者结合在一起如何影响汇率制度及汇率的变化。

蒙代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其“最优货币区”的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蒙氏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是他对国际金融领域,尤其是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向进行的有益探索和积极贡献。按蒙代尔的理论,在资本、劳动力、

信息等生产要素流动性不强的地区,进行汇率的调整方能取得成效;反之,在各种生产要素流动性颇强的地区,汇率的调整几无成效可言。所以,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强或弱,成为是否有必要进行汇率调整的准绳,而不是以国家或较小的区域来作为调整与否的尺度。在蒙代尔看来,货币区域决非越小越好,货币区域愈小,金融投机的可能性则增大;反之,货币区域愈大,货币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等功能发挥得更好;倘能全世界成为一个统一的大货币区,货币的各项职能则能获得最佳释放,故而在此情况下,该大货币区则成为最优货币区。依据蒙代尔的理论,一个货币区域的开放性亦十分重要,开放度越高,汇率变动的价格效应亦越显著。

自60年代起,在4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蒙代尔出版了不少专著,如《国际货币体系:冲突与改革》、《人、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货币理论——世界经济中的利息、通货膨胀和增长》、《建设新欧洲》等,以及逾100篇的学术论文。在上述丰硕的科研著述中,他积极地参加关于浮动汇率制与固定汇率孰优孰劣的国际经济学大论战。在论争

收稿日期:2000-12-14

作者简介:陈亚温(1944—),男,福建龙海人,教授,厦门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经济思想史专业博士生导师,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联系人,云南财贸学院APEC暨WTO研究中心顾问,主要研究金融、世界经济、西方经济学。

中,蒙代尔提出了上述的“最优货币区”的理念,蒙代尔在率先提出这一概念之后,麦金农、英格拉姆等从另外一些不尽相同的角度进行补充、深化及修正。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发表,人们普遍把它视为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理论基础,将蒙氏誉为“欧元之父”。事实上,蒙代尔仅能说是“欧元之父”中的一个,“维尔纳报告”中的维尔纳也有人称其是另一个“欧元之父”。按蒙氏的理论,欧洲货币联盟及其产物欧元,就是向“最优货币区”,至少是“次优货币区”方向进步的货币变革。当然,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概念,也还有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是变化的,货币区是否要常常随之重组?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并不一样,前者快,后者慢,应以何种要素作为“要素流动性”的科学、合理标准。虽则如此,应当承认蒙代尔从理论上阐述包括欧洲在内的货币区出现的必然性、优越性,为欧元的问世创造了理论前提。

二、经济理论基础 关税同盟的静态与动态效应

关税同盟的经济效应问题是经济一体化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而关税同盟仅是经济一体化的一种重要类型。欧元是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第三阶段的成果,而欧洲经货联盟是比之关税同盟层次更高的经济一体化形式。然而,关税同盟与经济、货币联盟这两种经济一体化的不同形式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前者属于市场一体化的范畴,后者是全面的经济一体化的高级形态。关税同盟是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基础,没有前者的初级阶段,则无后者的高级阶段。经济、货币联盟是关税同盟的必然归宿,有了关税同盟,经济一体化才会向纵深发展。欧元的理论基础,即是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理论基础。由于关税同盟是经济、货币联盟产生的前期工作、先决条件,所以我们在探索欧元的理论基础时,不能不追溯至关税同盟的理论基础,探本究源。

对于关税同盟的效应,一般西方学者将其区分为静态效应与动态效应。关于静态效应,范纳克(J. Vanek)堪称首创,其《关税同盟问题》一书致力于此。至于关税同盟的动态效应,西托夫斯基、科登、德纽等作了很好的工作,补充了范纳克的不足,并从崭新的角度探索了关税同盟的动态效应。

范纳克着力研究关税同盟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将其划分为“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的正反两种效应,将关税同盟的正效应——“贸易创造”,扣除关税同盟的负效应——“贸易转移”,得出关

税同盟的净效应。所谓的“贸易创造”源于关税同盟内部的贸易自由,由此所有成员国均可获得比较利益,由伙伴国的低成本产品取代了本国生产的高成本产品,结果增进了社会福利。“贸易转移”起因于关税同盟的排他性,由于实行了对外统一税率,关税同盟的成员国,减少了自同盟外进口低成本商品的机会,损失了部分社会福利。范纳克等人还进一步探讨了影响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孰大孰小的因素。指出影响的动因是:关税同盟的规模大小,同盟的规模越大,贸易创造越大,贸易转移则较小;关税水平高低,原关税越高,则贸易创造亦大;同盟中成员国的原贸易关系松散或密切,密切者,贸易创造愈大,反之亦然;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同盟中成员国的互补性愈大,则贸易创造大,贸易转移小,反之则反是;成员国的地区格局,地理位置近者,贸易创造大些;总之,贸易创造愈大,贸易转移愈小,则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就大;而若贸易创造越小,贸易转移越大,则同盟的福利效应就小些。

范纳克等学者就关税同盟问题对经济一体化理论的研究意义重大,它是欧盟以及目前遍及全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理论基础,对欧共体——欧盟包括货币一体化在内的整个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指导价值,并对尔后的经济一体化理论探索开辟了航道。但范纳克等人的关税同盟理论的致命弱点是偏重于静态分析,缺乏动态分析;侧重于短期效应分析,忽视长期效应分析。而轻视关税同盟内成员国宏观乃至微观经济政策动向对其经济效应和福利水平的影响,不重视同盟外国家有关外贸政策对与之有经济联系的同盟内成员国经济效应的冲击等。

对关税同盟之动态效应的研究,除上述的德纽、西托夫斯基、科登等外,日本的著名经济学家、一桥大学的小岛清教授和阿部清司教授也作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上述的研究主要致力于关税同盟如何长期地动态地影响成员国的经济成效,诸位学者集中探索规模经济、竞争绩效、投资运动三个方面。关于规模经济效益的产生,主要基于下列原因:(1)内部的自由贸易,使一些企业的市场由一国的局限范围扩大到经济一体化组织的若干国家,企业的生产规模因此拓展,达到一定程度时,规模经济效益油然而生;(2)统一大市场形成之际,由于市场需求的扩大,企业的产量也相应扩大,扩张至相当层次时,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逐步

下降,利润随之增加,规模经济产生;(3)由于贸易转移,同盟内的某些成员国的企业生产成本可能因此提高,产生“贸易抑制效应”,但却由此激发该国该企业的模仿及创新精神,生产效率的提高超过了“贸易转移”(亦即“贸易抑制效应”),导致净福利的提高。关于竞争效应,也主要由下述的几个方面展开。其一是市场范围扩大使企业的竞争压力倍增,从而导致企业兼并与收购,企业间的并购使企业的规模扩大,进而可获得规模效益;其二、竞争范围与压力的增大,迫使企业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势必努力降低成本,提高生产要素使用成效,各企业均如此,“水涨船高”,同盟内的竞争水平逐年提高;其三、关税同盟使寡头垄断的现象减少,因为边界开放,民族国家原有的垄断结构受到冲击,竞争市场逐渐形成。关于促进投资,主要从下面论述的几个方面产生。一是国内企业向同盟内的另一民族国家边境转移投资,如跨国公司的“边界导向战略”;二是同盟外国家为了绕过关税壁垒,打入关税同盟内以投资代替或部分代替贸易,投资冲动可见一斑;三是市场由一国的小范围扩大到统一大市场,强手如林,竞争更加残酷、激化,迫使企业加大研究与开发(R&D)的步伐,追加投资。

上述诸位学者对关税同盟动态效应及长期效应研究,弥补了关税同盟的静态效应研究者的非全面性,使关税同盟的效应更为完整。此种理论具有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跨国公司活动的实证基础,贴近实际,并对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但一些地方缺乏条件的假设,另一些地方有些言过其实,不免有夸大之处。

三、政治理论基础:联邦主义及实践

欧元区及整个欧盟的政治一体化理论主要有两种,一是新功能主义,二是联邦主义,二者有一定的联系,但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新功能主义又有人称之为新职能主义,原由艺术领域的理论、建筑学理论引入政治、经济学科,这一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哈斯是也。哈斯在其代表作《欧洲的统一: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中阐述了这样的理念:欧洲的经济一体化会自动地走向政治一体化。该派的理论家认为,由于欧洲在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建立了一些超国家的机构如欧洲议会、欧洲法院、共同体部长理事会、欧盟委员会等,这些代表新兴政治力量的机构,会把一体化扩展至其他部门,逐渐覆盖政治活动的主要领域。

另一种政治一体化理论是联邦主义,其影响

比之新职能主义更广、更深刻,实证基础也好得多。联邦主义的理念可以一直追溯到邱吉尔,他于1946年6月在苏黎世的一次讲话中曾提议建立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在内的“欧洲合众国”,可以视之为首次提出欧洲在各个领域全面合作的宏伟理想。邱吉尔的主张相继遭到欧洲的坚定民族主义者的坚决反对,先是死硬派戴高乐,尔后是铁夫人撒切尔。然而,联邦主义的拥护者在欧洲却仍不乏其人,如意大利的阿尔提艾罗·斯皮内利(Altiero Spinelli),他极力主张草拟一部“欧洲宪法”。又如法国的让·莫内(Jean Monnet),连著名的“舒曼计划”也受其影响,按莫内的战略构想,通过欧洲煤钢联营等欧洲经济一体化,就会向欧洲联邦迈出了决定意义的一步。事实上,莫内的主张也带有新功能主义的色彩。

笔者认为:(1)这两种欧洲政治一体化的理论均具有理论与实证价值,均在谋求欧洲的稳定,防止欧洲的痼疾——一直困扰欧洲达千年以上的战争(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悲剧重演。(2)两种政治一体化的理论见解、实现目标的途径不尽一致,但也有必然的联系,联邦主义者莫内的一些主张带有功能主义色彩即是明证。(3)新功能主义关于经济一体化会导向政治一体化的观点是正确的,但“自动”一说却过于绝对化。联邦主义期望欧洲成为一个大联邦的理念反映了一种良好的愿望,但目前能遂欧洲联邦之愿的可能性极小,在相当历史时期中实现这一愿望也无太大可能。经过艰苦的努力和漫长的时间,实现邦联的可能性倒是存在,但必定困难重重,《马约》关于建立国家联盟的设想则是更为贴近现实。

为了实现欧洲全面一体化的理想,欧洲的联邦主义者、其中不乏著名的政治家,为欧洲的联合做了不少工作。虽然下面要论述的主要是关于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努力,然而由于政治、经济(包括货币)的辩证关系,所以,致力于欧洲的政治联盟的建设,也与欧元的诞生及运作有着密切联系。因为以欧元为第三阶段成效的重要标志的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是欧洲政治一体化的重要基础与先决条件,而欧洲的政治联合归根结底也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亦即为欧元的成功运作,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深化、为欧盟的扩大及整个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服务。

60年代末,德国乃至欧洲著名政治家、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就任联邦德国总理。无独有偶,对欧洲一体化兴趣颇大,

且主张密切法德关系的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也登上了法国总统的宝座。在勃兰特就任总理的翌日,联邦主义者莫内寄语勃氏,劝其将欧共体转变为货币与政治联盟。由于勃兰特向来赞同联邦主义,加之其在任内首创“东方政策”,注意改善与意识形态迥异的东方——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关系,因此也颇为赞同谋求改善与法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试图用其“西方政策”来平衡“东方政策”,以消除共同体成员国对德国的疑虑。蓬皮杜虽不赞同联邦主义,但通过欧共体改善对德政治关系的意向则甚明确。

这一时期,欧洲国家的政治一体化努力,不仅表现在外交、防卫等方面的合作,还表现为按欧洲联邦制来设想共同体的财政预算。1973—75年的世界经济衰退之后,欧共体的经济一体化面临着新的挑战,各成员国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差异大,政治一体化随着英国的加入也增大了难度。如何摆脱此种困境,欧共体试图采用共同财政预算的方法,来消除经济、政治的差别,增大一体化的凝聚力。共同体委员会聘请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唐纳德·麦克道格尔(Donald MacDougall)为首组成专门小组进行为期3年的研究,并于1977年4月发表了专门工作报告。按该报告,以联邦制的财政原则来规划共同体的三级财政预算,即欧共体、成员国、各个区及地方当局。该预算方案为实现三个目标:稳定,使用宏观经济政策以维护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配置,以宏观经济政策工具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再分配,通过转移支付实现其再分配的功能。麦克道格尔的财政预算方案虽因诸多因素而未能真正实施,但其财政思想对尔后共同体的财政预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他按“欧洲联邦”式的主导思想来设计欧洲的财政预算更具有政治联合的意义。

80年代末以后,由于东欧剧变、两德统一、欧洲统一大市场建设等新局势的出现,欧共体政治联合出现了新的趋势。90年代伊始,欧共体委员会当时的主席德洛尔提出为实现“欧洲邦联”而进行政治一体化新努力的建议。法国其时的总统密特朗则在新年文告中除重弹“欧洲邦联”的调子外,还加进了一些新内容。德国前总理科尔则呼吁扩大欧洲议会的政治权力。比利时外交大臣和意大利的外长则分别发出“加速政治联盟”的意见。科尔和密特朗在1990年4月提出要在1993年底建成政治联盟的倡议,当然,政治家的呼吁固然有成效,却未免“雷声大、雨点小”,因为要建成

政治联盟决非易事,中坚力量法国、德国尚有分歧,更无需论及英国所持的消极态度。虽则如此,欧洲政治一体化的方向不可逆转,1989年,在奥地利提出加盟申请之后,芬兰、挪威、瑞典均相继向共同体提出入盟的申请,除了挪威、瑞士被本国“全民公决”否定外,其余3国在1995年先后加入欧盟,这三国均表示毫不保留地接受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

1991年12月,欧共体委员会在荷兰小城马斯特里赫特就欧洲的经济、政治联合达成协议,1992年2月,由共同体的外长、财长签署。《马约》包括《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和《政治联盟条约》两个部分。《马约》规定了政治联盟的基本目标:实行共同的外交政策、防务政策与社会政策。具体展开有:(1)共同的外交政策。要求重大的外交政策由欧洲委员会一致决定,具体行动由共同体部长理事会多数决定。(2)共同体的防务政策。《马约》对该项政策的行文采取折衷的办法(因有争议),既承认“西欧联盟”是欧洲政治联盟的防务机构,又承认北约仍是欧洲主要的防卫组织。(3)共同的社会政策。英国对此持异议,丹麦亦有微词,故上述两国保留“例外权”,其余成员国一致通过“欧洲社会宪章”。(4)政治联盟的核心。法国主张欧盟发展成“邦联”,德国依然希望建立“联邦”,英国对法、德的构想均不赞同,也有部分成员国意见介于法德之间,最后折衷、妥协为“国家联盟”。

最近,德国外长菲舍尔在德国国内的讲坛上,频频发出按美国模式建立欧洲联邦的信息,勾画出“欧洲合众国的蓝图”。他指出,“联邦”的字眼并不可怕,欧洲央行已是“联邦”的一种“存在”,欧元是朝着“欧洲联邦”这个最终目标迈出的一步。他甚至认为应选出一个欧洲“总统”,欧盟的立法权应由欧洲议会的两院来承担。但菲舍尔的疾呼,迄今仍曲高外寡。

参考文献:

- [1] [英] A·M·阿格拉. 欧洲共同体经济学[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年版.
- [2] [英] 约翰·平德. 联盟的大厦: 欧洲共同体[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
- [3] 陈亚温、李双等. 欧元论[M].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8年.
- [4] Willem Molle. The Economic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ory, Practice, Policy[M]. Published by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1997.
- [5] Pääti Minkinen & Heikki Patomäki.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M].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7.

责任编辑 鸿雁